airiti

世代之間的正義與分配：年齡與經濟世代對薪資公平正義認知*

張一彬

淡江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對於世代的劃分是著眼於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成年的民眾，運用薪資公平正義認知的經驗性資料來檢視世代之間對分配正義的認知。方法上本文運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來緩解因年齡與世代兩者高度共線關係所導致估計值失眞的問題。研究發現薪資公平正義認知不但具有世代之間的差異，同時在年齡群組上也呈現出明顯的不同。其次，個人層次解釋變數的效果上，男性、有婚姻關係、高教育年限、自認爲是上層社會階級、以及大陸各省市族群對自身薪資公平正義認知較高。這些傳統上屬於社會優勢族群在資源與機會的取得上具有優勢，產生的結果就直接反應在對自身薪資收入的感受。另外，薪資公平正義認知不同年齡層之間呈現出生命週期效果。20-29 歲年齡層的民眾是「薪情」最不美麗的一群，30 歲以後民眾才漸漸地滿意自己的薪資。相對的，不同經濟世代間的薪資公平認知呈現出兩極的發展。這樣一個世代正義的樣態有可能民眾對經濟全球化

* 收稿日期：106年 7 月 7 日；修回日期：108 年 3 月 19 日；接受刊登日期：108 年 4 月 29 日。
DOI：10.6683/TPSR.201906_23(1).0003

下，產業結構轉變造成薪資結構變化的反應。

關鍵字：年齡、經濟世代、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分配正義、薪資公平正義認知

壹、前言

正義是存在於所有人心中的一種觀念。對於正義或不正義的主觀感受（feelings）是正義心理學（psychology of justice）的主要研究焦點，這個途徑也不同於哲學領域中對客觀正義原則的討論與宗教上對正義議題的界定。社會正義的研究焦點著重在人們對於什麼是正義或公平的主觀判斷上，是有其重要性的。主要的理由是，人的想法、感受與行爲深深地受到他們曾經歷過的正義與不正義經驗的影響。因此，個人對於正義的感受就是他們與其他人互動時的重要行爲準則。比方說，人們如何地回應家庭補助、失業救濟與職業訓練等政策支出的變化，取決於他們如何地看待公平這回事。社會正義的心理學研究試圖瞭解主觀正義判斷的原因與結果，例如對於 Rawls（1971）所提出來的正義哲學原則，政治學家就試圖檢驗個人對這些正義則是否感覺到公平或是不公平（Fröhlich and Oppenheimer 1990）。

社會正義研究有其重要性的第二個理由是，社會正義理論的預期常常是違反直覺的，而且它的發現也不同於佔據社會科學主流地位的自利模型的預期。個人動機的理性觀點認爲人是受自利所驅駛而不是對正義的關心，因此任何理論有別於自利模型預期的都有理論上與社會上的重要性。比方說，自利模型通常預期那些在工作上獲得更多薪資的人是較爲滿足的，但是這個預期並沒有得到經驗資料的支持。實際上人們對薪資的滿足，取決於他們對獲得的薪資是否覺得公平。那些覺得自己的

airiti

薪資是公平的人，比那些獲得較高薪資但是覺得不公平的人來得有更高的滿足感（Walster et al. 1978）。

社會正義在行爲上的研究結果，也常常與自利或理性選擇模型的預期不一致。例如，人們願意去懲罰從事不公平行爲的人，即便這樣的懲罰對他們來說成本很高。再者，在權力不均等的情況下，自利模型預期擁有較大權力的人會使用他們的權力來獲取更大的獲利。實證研究發現擁有較大權力的人的確會這樣做，但是這些研究也發現擁有較大權力的人在獲取利益的過程中，並不會完全運用權力的優勢（Güth et al. 1982; Ochs and Roth 1989）。這些擁有較大權力者的行爲似乎反應出對公平的重視；而他們不願意運用所有的資源與權力優勢在獲取利益上，這也符合正義研究所指出的：人是關心正義的（Smith and Tyler 1996）。根據 Smith 與 Tyler（1996）的研究，人會支持他們認爲是公平的公共政策，即便這些政策並不會使他們直接受益；但不幸的是，許多政策制定者受到理性模型的影響，擔心政策會傷害到某些重要利益團體對其的政治支持，而不願冒險提出公平的政策。

本文研究的焦點在於年齡群與出生世代之間的正義。年齡層與世代間的正義，已經成爲當代社會主要關心的議題。根據過去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歷史，工人的處境是最需要被解決的社會問題。然而，大部分西方福利國家運用制度與政策方式，使工人終其一生都能有穩定的生活保障後，工人的問題終於獲得解決，方法是運用類似國民年金的隨收隨付（pay-as-you-go）的退休金制度，或是一般賦稅制度（Kohli 1987）。有些西方學者則大膽預言，隨著福利國家的發展，工人與資方的階級衝突在二十一世紀先進工業化社會中將愈來愈不明顯，取而代之的將會是世代衝突（Bengtson 1993; Foner 1988）。世代衝突與矛盾的現象主要來自於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因爲社會安

airiti

全制度的發展，年長的退休者成爲福利制度的主要受益者，而年輕工作者只是制度下的淨支出者，兩者之間形成不平衡的狀態；二是因爲低生育率以及高齡人口增加等人口結構的改變導致勞動參與率下降，使國家財政稅收無法維持福利制度運作，造成年輕人可能退休後領不到退休金的現象。

值得一提的是，年輕人與老年人對於資源的衝突與競爭並不是現在才有的現象，它在過去傳統社會中是很常見的議題（Foner 1988）。但隨著福利制度的發展，衝突的形式與場域已經改變了。正義的議題在調和衝突，以及在這衝突中合理化各種解決方法的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當代民主政體的精神是強調以民意爲依歸，政府決策的合法性要有正義觀念的基礎。正義在本文中的使用不同於法律領域中應報的正義概念，也不是哲學領域中討論較多的應然面的規範性正義觀，而是一種經驗性的公平感受，本文特別從薪資收入的面向來檢視不同世代間經驗正義觀點。對大部分的人來說，薪資是非常重要的，因爲這是他們唯一的金錢收入來源，而且在工業國家中，它對個人生活的很多面向都至爲關鍵。當個人認知到自己的薪資與他人相比是不合理的，這認知會與各種不同的情緒與行爲結合，對自己與對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不正義的認知小到會產生個人壓力，大到會造成革命或國際衝突。

過去在研究世代效果常會面臨到嚴重的方法上的問題，也就是世代與年齡這兩個變項混淆的困擾。主要原因是若以固定間隔的年齡層來當作世代處理，則得出的世代效果我們無法說它眞的是世代效果，或只是單純的生命週期的效果。若將年齡與世代置於同一層級進行統計分析，則會有共線性的問題。另外，之前的文獻常將世代劃分爲年長與年輕的兩世代分類，或是老、中、青三個世代的分法。本文認爲這樣的世代劃分會失去很多重要的訊息，也無法將隱藏在世代背後的重要脈絡因

airiti

素突顯出來。本文以臺灣重要的經濟發展階段爲基礎，劃分出六個經濟世代，因爲歷史經驗與集體記憶是形塑不同世代價值與態度差異的主要因素。同一世代的一群人經歷相同的生活，在相同的年紀遇到同樣的歷史與社會事件，而世代效果就反映了個人與總體歷史與社會脈絡之間互動所形成的生活經驗。爲了讓這些問題的影響降到最低，本文運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檢視台灣人民對合理正義的薪資水準認知在世代之間的差異。分析的資料是運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2009 第五期第五次：社會不平等組」調查訪問資料（傅仰止 2016）。

章節安排如下：在下一節，我們會討論年齡與世代對正義的認知內容是什麼？第三部分討論世代效果與生命週期的理論基礎，以及經驗證據。在這一節筆者提出以經濟發展階段爲基礎的經濟世代劃分概念，並簡單介紹每個階段經濟發展的特徵。第四部分是針對資料、測量與模型建構的描述。第五部分則是對分析與經驗結果的整理，最後一部分則是在這經驗結果上進行討論，並且描述本研究所面臨的限制。

貳、年齡與世代之間的衝突與正義評估

本文所採用的正義概念是指個人對於什麼是對或是什麼是錯的一種主觀認知，它是個人對於對與錯、正義與不正義、公平或不公平的主觀判斷，不同於哲學家所討論的客觀的規範性正義原則。在討論年齡與世代對薪資正義認知之前，必須先釐清年齡與世代的概念。黃忠正（2012）將世代的概念區分爲一時間之世代、異時間之世代、社會之世代、以及家庭之世代四種。所謂的一時間之世代是指在相同的一個時間中，同時存在的老中青三代；異時間之世代則是指「過去曾生存、現在正生存、未來將生存的三個不同時間的世代」（黃忠正 2012）；

airiti

社會之世代指的是一個社會經驗的命運共同體，他們經歷了相同的歷史遭遇和社會情境，因而烙印著相同的時代經驗和社會記憶，而產生出集體的認同；最後，家庭之世代是指家庭中的出身順序，標示出親屬之間的關係，父親爲一世代，兒子爲另一世代。就世代的討論而言，本文聚焦在一時間之世代與社會之世代這兩概念上，家庭之世代並不適用於本文的討論，而異時間之世代則受限於經驗資料的可得性，也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值得一提的是，就概念上來看，一時間之世代其實就是以當前年紀爲標準，區分出來的社會中特定年紀的族群。爲了避免混淆，本文以年齡層一詞來指涉一時間之世代這個概念。

台灣既有文獻對世代與正義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異時間之世代這一概念上，也就是跨世代正義問題。這部分文獻著重在規範性的理論層次討論我們對未來人類應擔負著道德責任，而且這些責任乃奠基在所謂「跨世代正義」的考量（戴華 2016）；或是從環境變遷的角度來看世代正義的關懷（許耿銘、紀駿傑、蕭新煌 2016）；亦或是從政策的角度來討論如何在制度上與政策上保障未來世代的權利（黃寄倫、冷則剛、林煥笙 2016；蕭代基、顧林 2016）。這些文獻關心的焦點在於生存在過去、現在與未來三個不同時間點的世代之間規範性的正義探討，比較少從經驗資料的角度來討論身處不同世代的人類是如何主觀地看待自身的正義。不同於過去研究，吳親恩（2017）有系統地從實際資料來討論不同世代的主觀正義認知與評估，他對世代與正義的討論是從一時間之世代這個概念出發，分析以年齡作爲區分基礎的年青與年長世代對於正義的認知與評估。他發現世代是影響正義綜合評價的重要因素，也是與民衆的經濟生活關係很大的結構性因素，因爲產業結構改變與產業外移，使得台灣年輕世代面臨低薪、高失業率、發展機會受限等問題，導致年輕世代普遍認爲社會不是正義的。吳親

airiti

恩（2017）對世代的討論著重在一時間之世代（年齡層）這個概念，在這個基礎上，本文加入了從社會經驗與集體記憶爲區分基礎的社會世代這個概念，以期能對不同世代對正義評估提供更爲完整的討論。

與年齡和老化有關的正義關懷，並不是以個人老化的過程出發，而是以身處不同年齡群與社會界定的出生世代角度來看。從分配正義的角度來看，年齡群分類本身沒有什麼問題，會產生問題的是出生世代的分類（Daniels 1989; Foner 1988; Kohli 2006）。Daniels（1989）認爲身處在特定年齡群的人也同樣屬於一個特定的出生世代；隨著時間的推移，一直有新的出生世代進入一個特定的年齡群裏，形成一個年齡群內包含了數個連續的出生世代。例如，20 年前，65 歲以上的年長者只包含 1931 年以前的出生世代；現今（2016 年），他們包含了所有 1951 年以前的出生世代。依照 Daniels（1989）的觀點，年齡群組分類本身不會老；相對的，出生世代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老化，他們會經歷過人生不同的階段，在不同的時間點，進入不同的年齡群。[1] 出生世代是一群具有特殊經濟經歷的一群人的集合，世代之間對社會財（social goods）該如何分配才是正義分配的問題，在過去三十年間持續吸引研究者的關注。

正義爲什麼重要？人們關心正義議題的動機是什麼？社會心理學家提出的許多解釋來回答這個問題，與本文研究焦點有關的則是資源基礎的正義理論（resource-based theories of

[1] 值得一提的是，年齡群的分類本身並不是自然給定的，而是透過生命歷程的制度化過程所形成的社會性建構（Kohli 2006）。例如，65 歲以上的年長者被制度性地界定爲是退休的年紀，改變這個退休年齡的門檻將會產生不同規模的年齡群，並且改變社會財分配上的平衡。在西方社會，提高退休年齡似乎是退休金改革的一個主要方法；然而，這樣的改革卻難以執行，因爲即便退休年齡的門檻是社會建構的，但並不意謂這個門檻是可以任由政治力來操弄。

airiti

justice）。資源基礎的正義理論認爲，人們與他人從事社會互動的目的希望能更有效率地獲得個人想要的資源。就每個人來說，個人可以創造生活所需的所有物品而無需跟他人互動，雖然這是有可能的結果，但如果能夠在生產食物與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專業化，則會爲生活上帶來莫大的好處與便利。一個人可以獨自生活而無需跟他人互動，但如果他能與他交換資源的人合作，則他的生活品質一定會變得更好。因此，社會互動所帶來的好處是能與他人交換資源。

資源基礎的正義動機心理模型假定，當人們與他人互動時，人基本上是受自利所驅使（Thibaut and Walker 1975; Walster et al. 1978）。同樣的，不同的年齡層與世代之間的互動，基本上也是受自利所驅使，在互動的過程中世代之間會發展出公平的資源分配制度；同樣的，當社會成員在年輕或進入老年的時候，能夠與其他年齡世代的成員一樣，獲得相同的對待與尊嚴。然而，社會經濟條件的不斷變化，使得不同世代在生活型態上產生差異，在價值取向上產生衝突。大多數的先進工業國家在年金與退休金的支出比較多，在研究發展、教育訓練、以及其他對未來投資性的支出比較少，這無異是把年輕世代的資源分配給年長世代，而年長世代的富裕是來自年輕世代的負擔。

在所有當代國家中，年長者是公共財富移轉機制的主要受益者，而孩童所需的資源則大部都是由父母來支助，即便我們將政府支出的國民教育成本與育兒津貼計算在內，仍然只佔孩童所需資源的一小部分。在年齡群之間不平均的公共資源分配，如果這樣的分配結果會導致某個團體的待遇長期地比另一個團體差的話，這結果可能會被認爲是不公平的或是沒有效率的。然而，在年齡群之間不平等的待遇原則上是完全合理的，理由是年齡不是固定不變的特徵（Daniels 1989），身處於同

airiti

一個年齡群的人其成員身份並不會被視爲是固定的，而是所有人都會依循著制度化的進程進入不同的生命階段，從這個年齡群進入另一個年齡群地經常改變身份。

相反的，社會世代身份就不是那麼一回事。社會世代的概念指涉的是出生於特定時期的一群人的集合，他們在相同年紀經歷了共同歷史事件，這記憶持續了整個生命歷程。就一般的觀點來看，我們無法任意地離開屬於我們自身特有的出生世代，因此世代成員的身份是固定的而無法變動的。也因此世代的概念被許多學者視爲是社會動態分析的關鍵，它是社會再製（social reproduction）與社會變遷的基本單位。在一些沒有權力集中化與階級基礎的階層化傳統社會，社會組織以及權力與責任分配都是依據年齡與世代標準來進行；然而，在當代社會，社會組織分化並且在政治、文化與經濟等面向上形成制度性的聯結，例如，在西方社會，世代衝突主要爭論的場域已經從政治與文化轉移到經濟面向上。世代之間的政治權力分歧，已經轉變成對公共資源分配的分歧。

從公共資源分配的角度來看，每一個出生世代都會面臨到對未來的世代應該負有什麼義務的問題。這問題涉及到分配，資源從一個出生世代轉移至另一個世代，這樣的資源轉移是不同生命階段的分配，而不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資源分配。生命歷程中的資源分配是任何人只要到了人生歷程的某個階段，就能享有某些專屬的公共資源，但若資源只在個人間移轉，則有些人可能窮盡一生都分不到半點好處。所以，對未來世代的義務可以被理解爲：是否我們現在這個世代要節制對資源的使用，不管是不能再生的環境資源或是可累積性的資本，好讓之後的世代有財力或能力可以過更好的生活？

世代義務的問題，Rawls（1971）認爲我們的首要工作是保留適量的資本與無法再生的資源，以確保之後的世代能在有

airiti

利的位置維持正義的制度，方法就是透過無知之幕的機制進行分配。另外，Barry（1978）則以不同觀點來看世代義務的問題，他認為如果大家都關心未來世代（例如，他們的孩子或孫子）的福祉，則未來世代的福祉就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公共財。為了確保公共財不會被濫用，因此有必要透過強制性的方式將資源保留下來給未來世代。Barry 的說法與 Rawls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Barry 認為除了認為要保留資源外，還要保留機會的平等給未來的世代。至於要保留多少資源與機會給未來世代，並非本文能夠回答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也超出本文的研究範圍。不過這裡要強調的是，世代正義的問題往往是和出生世代間薪資轉移與實物援助的制度有關，正義的分配制度在整個生命歷程中，將能產生足夠支撐生活的正義薪資與健康照護。

每一個出生世代都希望能生活在正義制度下，但是制度或是資源轉移的機制在實際運作上，會面臨到許多的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包含了人口結構的轉變、經濟成長率的變化、以及科技的突破，這些變化都將影響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產能。沒有預期的人口成長率改變或經濟生產力的變化，都會影響國家徵取稅收的數量。當勞動人口增加而且人人變得富有，他們所繳的稅收就足以支付退休人員的福利；但是當人口與經濟成長率下降，其影響所及將會使不同出生世代的福利比例產生改變。所以，問題來了，當整個社會的經濟生產力增加時，是否退休的民眾也可以享受經濟成長的部分果實？或是這些成長的果實應當完全屬於勞動者享有。這些種種的問題都會產生世代之間的矛盾，因為資源分配與薪資轉移的制度是在一個不完美的環境中運作，這些制度總會遇到各種可能的不確定性與政治算計。台灣實施多年的年金制度也因為人口與經濟的不確定性因素與一連串的政治算計，面臨到不得不做改革的時候。

airiti

Preston（1984）與 Thomson（1989）很早就提出世代間公共資源分配的爭議，西方社會發展的經驗證實了這兩位學者的論述。從英國的發展經驗來看，戰後嬰兒潮世代享盡國家的福利與安全，使得年輕世代在國家福利配置上受到排擠，世代之間的緊張是顯而易見（Higgs and Gilleard 2010）。Zannella（2017）針對義大利政府轉移支付進行分析，發現對年長者的重分配措施是很普及的，但政府對於解決年輕人面臨的風險與社會需求所需的資源則很缺乏。Gibson-Davis 與 Percheski（2018）近期的研究也發現，美國社會年長者家戶比擁有小孩的年輕家戶有更高的財富水準，而且兩者財富不平等的現象持續惡化。綜合上述討論，世代衝突的起因主要有兩種，一是因爲社會保險（social security）制度的發展，使得老年人成爲福利國家的主要救濟對象，形成老年人享用福利資源而年輕人努力工作付出的一種現象；另一個原因是來自於出生率低與壽命增長等人口結構改變，導致勞動人口減少，享受福利資源人口增加的不均衡現象。人口老化與低出生率所帶來的人口結構改變，大大地威脅到當代福利國家對民衆未來生活照顧的承諾，同時削弱了兌現承諾的能力（Esping-Andersen 1996; Higgs and Gilleard 2010; Thomson 1989）。Schmähl（1989）對西德人民勞動參與和退休金制度的研究發現，如果現行（當時）退休金制度不加以改革的話，未來三十年西德公共資源分配會更加惡化。西德的例子或許年代有些久遠，但 Schmähl（1989）的研究所點出的問題是，所有先進社會在未來都會面臨到相同的公共資源分配的問題，形成世代間的矛盾與衝突。

airiti

參、世代效果：理論與經驗證據

一、生命週期與世代效果

生命週期與世代效果是政治社會化研究的主要焦點，這研究途徑試圖回答的問題是：個人如何地塑造政治態度，以及這些態度如何地隨時間而轉變？政治社會化文獻中強調兩種效果：生命週期與世代效果（Braungart and Braungart 1986; Dalton 2013; Neundorf and Niemi 2014; Niemi and Klingler 2012; Sapiro 2004）。生命週期效果強調人們的態度會隨著生命進入不同的階段而有所轉變。人的心理與生理特質會隨著年齡變化，在不同的生命階段對個人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爲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Braungart and Braungart 1986）。比方說，年輕人可能有著與年長者不一樣的政治態度與價值。他們比較具有理想性，但隨著年紀增長他們的政治價值會慢慢地趨近現實與保守（Dalton 2013; Möller 2013）。在臺灣的經驗研究顯示，生命週期的效果可能是多重非線性的趨勢，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效果（崔曉倩、吳重禮 2011）。

相對的，世代效果則認爲，青春期與成年時期的早期經歷了特別的經濟、政治與社會脈絡的世代們，這些世代社會化的方式會持續到他們年老（Bartels and Jackman 2014; Bhatti and Hansen 2012; Mannheim 1970）。因爲不同的世代在不同的時間形塑他們的政治態度，並且這些態度隨著時間的遞移維持相對穩定，所以當現在的年輕世代年紀增長時，世代間的態度差異也不會消退。爲什麼同一世代享有相同的政治態度與行爲？Mannheim（1970）認爲同一個世代出生在特定歷史時段中，會有相似的社會位置形塑其價值觀與政治經濟行爲。而之後的研究者 Eyerman and Turner（1998）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爲集體記憶才是同一世代共享相同價值觀與文化習性的基礎，而非

airiti

受到社會位置的影響。

許多領域的文獻提供了生命週期與世代效果的研究例子。在投票行爲文獻中，成人角色論述認爲政治態度與個人在生命週期所處的位置高度相關，而且與年齡呈現簡單的函數關係（Blais et al. 2004; Niemi et al. 1984）。選舉行爲研究者採用這個觀點，認爲生命週期的論述可以解釋爲什麼年齡總是與選民的投票率呈現出正相關（Blais and Loewen 2009）。Plutzer（2002）認爲因爲習慣是隨時間推移而發展出來的，而且年長的公民比年輕的公民有更多機會在選舉中投票，所以當年齡增長，投票就變成一種習慣。這種與年齡相關的社會化效果會被放大，因爲年輕人基本上缺乏政治上相關的資源，如金錢、社會地位與人脈，這些正是年長者隨著年記增長後有擁有的優勢。相對的，世代效果的論述認爲，政治態度的變化很大一部分是取決於社會經濟與政治脈絡的影響，接替的世代則在這脈絡環境下成長。世代觀點的論述認爲投票率的下降是因爲選民結構的改變，因爲具有強烈投票意識的年長者漸漸地被缺乏公民責任感的新興世代所取代（Blais et al. 2004; Rubenson et al. 2004）。

相對於投票行爲研究，政治社會化研究者對一些革命、民主轉型與後共產主義國家的研究發現，民主轉型有類似政治社會化的效果，制度的轉變對人民的價值觀與政治態度的變化產生影響（Jennings 2007; Lerner 1980; Montada and Schneider 1991）。對社會正義研究者而言，他們所關心的議題是，隨著制度的變化，正義信念是否能維持其一致性。相關文獻關於生命週期與世代效果對正義信念的影響，提供具有啓發性的研究例子（Lerner 1980; Montada and Schneider 1991）。在政經轉型對社會正義影響的文獻中，Jasso（2000）研究捷克、匈牙利、俄羅斯、保加利亞、以及東西德等幾個國家，從 1991 到

airiti

1996 年間政治與經濟轉型對這些國家人民正義評價的變化。她發現東歐新興民主國家人民的正義評價深受政經轉型的結構性因素所影響。另外，Verwiebe and Wegener（2000）同樣針對捷克、匈牙利、俄羅斯、保加利亞與東德等國家進行分析，他們發現政經轉型成功與否的生活經驗，影響人們對合理的正義收入的認知。也就是，生活在政經轉型成功的國家，如東德，其人民對合理薪資的認知是趨於正義的；但生活在政經轉型相對不穩定的國家，如保加利亞與俄羅斯，其人民對合理薪資的認知是趨於不正義的。因此，政治態度、信念與價值深深地受到政治、經濟與社會脈絡的影響，生活在特別脈絡環境下的世代也會發展出屬於該脈絡特有的個人特質。

二、經濟發展階段的世代劃分

臺灣世代研究的文獻相當豐富，同時也累積不少研究成果。從研究途徑來看，有一類文獻是運用質化訪談或歷史文獻資料，探討特定出生世代的集體記憶差異（蕭阿勤 2010）；另一類則使用社會調查資料，探討不同出生世代的國家認同、民主價值與政治效能感（王靖興、孫天龍 2005；吳乃德 2005；林宗弘 2015；陳陸輝 2000；2003；陳光輝 2010；張佑宗 2011；盛杏湲 2010；黃信豪 2011；游清鑫、蕭怡靖 2007）。研究者對於如何地劃分年齡與世代，大家的看法也是很分歧。林宗弘（2015）對過去文獻在年齡與世代劃分及其所產生的效應做了詳細的討論，他認爲對於歷史事件的不同集體記憶才是政治分歧的來源。二次戰後臺灣經歷了政權交接與白色恐怖、威權體制下的經濟成長、民主轉型與政黨輪替，不同世代的受益者與受害者會建構出不同的集體記憶，因而產生不同的政治態度與行爲，而其態度的差異不是線性或曲線關係，而是歷史經驗與集體記憶的建構（林宗弘 2015；蕭阿勤

airiti

2010）。本文認爲歷史經驗與集體記憶是形塑不同世代間價值與態度差異的主要因素，但不同於過去政治世代文獻以政治事件或政治發展脈絡爲世代劃分的基礎（林宗弘 2015），本文以臺灣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與對不同發展階段的集體記憶作爲世代劃分的基礎。主要是因爲根據過去的研究，人們對正義的關心與所處的環境脈絡息息相關。正義的認知是人與人之間比較出來的結果，而人們對於自身正義處境的關心程度會受到所處的社會脈絡影響。Leventhal（1980）的研究發現，人們並不是時時刻刻都關注正義的議題，因爲正義的常規時常是人與人之間例行性的或是不相關的互動中所形成，並且這些正義常規會隱身在環境脈絡中，只有在某些情境下正義關心才會被起動。環境脈絡會從兩個面向來影響人們對正義的認知：一是所處的環境是社會資源或機會的充足或匱乏；另一個是所屬的社會結構是多元的（pluralistic）系統或是單一化（monolithic）的系統。

在社會資源或機會的脈絡下，過去的文獻指出，正義關心與資源的可得性之間呈現曲線關係。例如，Hogan and Emler（1981）的研究發現，當社會資源很豐富的時期人們並不太在意正義的議題，但是當社會資源狀況屬於不多也不少的中等水準時，在資源分配上開始有利益上的衝突，人們對於正義的關心也開始上升。當資源極度缺乏的時候，人們對於正義的關心又開始不太在意，因爲社會上沒有資源可以分配，當然也不會造成利益上的衝突。另外，Booth（1983）觀察人們對資源稀少性的反應時發現，分配正義的規範在資源稀少時，其適用範圍會更加限縮。換言之，在資源稀少時，分配正義的規範是用不到的，而且不需要。另一方面，有些文獻也提出，不同的社會結構脈絡會影響人們對於正義的考量。Leventhal（1980）認爲人們對正義關心的程度，部分會受到社會結構本質的影響。

airiti

例如，在多元系統的社會結構下，人們對正義的在乎程度是很顯著的；相對的，在單一的價值體系的社會下，人們對於正義的關心程度就比較不是那麼明顯。這意謂著當社會的多元性愈高時，人們就會愈注意正義與不正義的議題。因此，當社會上的組織或團體一直在出現，社會規則一直在進步與發展時，正義議題才會受到人們較多的關注。

在參考熊瑞梅等人（2010）分析戰後世代公民參與、林宗弘（2015）政治世代的劃分，以及瞿宛文（2007；2011）對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研究之後，本文將台灣民眾出生世代依據經濟發展階段區分爲六個經濟世代：（一）日治時期殖民地經濟世代：1945 年時已成年（年滿二十歲）的台灣民眾，在日本殖民地經濟模式下，台灣提供原料和廉價的勞工以供輸日本國內的需求，而此時期生活物質相對貧乏；（二）戰後經濟重建世代：1946 年到 1952 年間台灣經歷過戰後工業資源極爲缺乏，國共內戰政府將大量民生物資運往中國大陸，同時貨幣濫發造成物價飛漲。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政府財政困頓，缺乏足夠資本進行重建。1949 年實施幣制改革，到 1952 年惡性通貨膨脹受到遏制，混亂狀態結束；（三）進口替代工業化世代：1953 年到 1960 年間臺灣推行土地改革使得地主階層消失，農產增加，農業盈餘轉移至工商業；而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的實施使臺灣出現眞正資本家，也使紡織工業快速發展；（四）出口導向外資湧進世代：1961 年到 1973 年因國內市場飽和，轉而以出口爲主的經濟發展模式，此時期政府放寬貿易管制，鼓勵出口並創造鼓勵私人與外人投資的環境，外資大量湧進，各種急速成長的產業中以電子業最具代表性；（五）工業升級經濟奇蹟世代 ：1974 年到 1988 年間臺灣經歷了經濟困境、外交與政治的挫折，使政府重新負起發展經濟的主要角色，推動工業升級，建立自主經濟體系，進行大規模公共投

airiti

資，台灣所得成長持續提高，使得台灣晉身亞洲四小龍之列，更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六）經濟全球化與民主轉型世代：1989 年之後臺灣在政治上開始民主化，在經濟上開始與全球市場接軌，此時期經濟成長趨緩，全球化浪潮下加速臺灣產業外移，貧富差距、分配不均的問題開始浮現。

在討論環境脈絡對正義認知的影響時，本文認爲從經濟發展的面向來劃分世代，會比從政治面向的世代劃分，更能掌握住社會資源或機會的多寡以及多元或是單一社會結構的本質上變化。因此，我們可以預期成長於機會與資源較爲豐富的世代，會比成長於機會與資源相對匱乏的世代，更在意分配的結果，在正義認知上也相對會比較失落。同樣的，成長於相對多元社會下的世代，會比長在單一化社會的世代，更關心正義，也更在意分配結果。

肆、資料、測量與模型建構

一、資料來源與變數測量

本文使用的資料來自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2009 年社會不平等題組（傅仰止 2016），資料調查是以台灣地區具有國籍之十八歲以上民衆爲研究母體。利用分層隨機三階段（層級、村里、個人）方式進行抽樣，抽出的所有個人都必須經過訪查。資料蒐集則以面對面問卷調查方式，於 2010 年 7 月 19 日開始執行到同年 8 月 23 日。最後，實際完成訪問樣本數爲 2,026 受訪者。

薪資正義認知是本文的核心變數之一，對大部分的人來說，薪資是非常重要的，因爲這是他們唯一的金錢收入來源，而且在工業國家中，它對個人生活的很多面向都至爲關鍵。當個人認知到自己的薪資與他人相比是不合理的，這認知會與各

airiti

種不同的情緒與行爲結合，輕度的不正義的認知會造成個人生活上的壓力，不正義認知嚴重時甚至可能會造成革命或國際衝突。在操作上筆者引用 Jasso（1978, 1999）與 Jasso 與 Wegener（1997）提出了薪資正義的對數比值模型。根據這個模型，薪資正義認知是實際報酬與合理（應得）報酬比值的自然對數，函數表示如下：

$$\text{薪資正義認知} = ln\left(\frac{\text{實際報酬}}{\text{應得報酬}}\right) \qquad (1)$$

方程式（1）同時也可以簡化爲正義認知函數，表示如下：

$$J = ln\left(\frac{A}{C}\right) \qquad (2)$$

根據分配正義理論，正義與不正義的感覺是主觀的建構，與觀察者的感受息息相關。當我們思考財富在社會上的分配時，社會上每個成員對於他們自己獲得的實質報酬與他人獲得的報酬做比較並做成判斷。每個觀察者對特定的獲益者應該獲得的合理報酬（以 C 來代表）會有個判斷，並且將這個判斷與該獲益者實際獲得的報酬（以 A 來代表）進行比較，所以產生出來的正義認知（以 J 來代表）是實際報酬與合理報酬這兩變數的函數。當獲得的實際報酬愈多，正義的感受就愈高；當期望的應得合理報酬愈多，正義的感受就愈小。

正義認知函數的對數建構有幾個特點。首先，它提供了自然的方法詮釋正義認知的結果，也就是運用數字對分配與重分配正義觀提供容易理解的陳述。例如，數字爲零代表著完全正義（實質獲得的報酬與期望獲得的報酬一致）；在好的事務分配上，比如給工人的薪水、給學生的分數，正的數值代表不

airiti

正義的過度報酬（unjust overreward），而負的數值則代表不正義的低度報酬（unjust underreward）。[2] 另外，人們的生活經驗是：對報酬短缺的感受會比報酬過多的感覺更來得強烈與不公平。若一個人認爲其合理的報酬是新台幣三萬元時，當實際薪資是新台幣二萬五千元，他／她對自身薪資待遇的不正義感，會更甚於當實際薪資是新台幣三萬五千元時，而正義認知函數能將這樣的生活經驗量化。

社會不平等題組調查資料中有關分配正義函數中實質報酬（A）的問題是：**請問您個人平均每個月所有的（稅前）收入差不多有多少？**（包括薪資、年終獎金、年節分紅、加班費、執行業務收入、自營收入、投資利息、房租、退休金、或父母／小孩給予的生活費等收入）；關於合理報酬（C）的問題是：**您覺得您目前的工作收入是合理的嗎？本題不是要問您想要賺多少，而是說，就您的技能與努力來講，這樣的工作收入合不合理**。然而，在正義評價指標建構時，社會不平等題組並沒有詢問受訪者認爲合理正義薪資的確切數目。在缺乏合理正義薪資數目的資訊下，本文採用 Stevens 提出來的心理物理學（psychophysics）理論，及其相關心理轉換過程的經驗研究成果（Stevens 1975/1986; Marks 1978; Bolanowski and Gescheider 1991），運用數理方式推算個人認知的合理正義薪資數目。

二、以心理物理學爲基礎的正義薪資數目推算

正義薪資評價（J）是建立在實質薪資收入（A）與合理薪資收入（C）的資訊上。因此，進行正義薪資評價之前，

---

[2] 在不好的事務分配上，正的數值代表不公平的低度負擔（unjust under-burden），而負的數值則代表不公平的過度負擔（unjust overburden）。在稅賦的例子上則是低度稅賦負擔（undertaxed）與過度稅賦負擔（overtaxed）；在犯罪刑罰上則是低度處分（under-punished）與過度處分（over-punished）。

airiti

我們必須知道受訪者的實質薪資數目與認知的合理薪資的數目。在實質薪資數目的資訊，我們詢問受訪者：請問您個人平均每個月所有的（稅前）收入差 多有多少？然而，獲得受訪者認知的合理薪資是相對困難的工作。在這裏我們運用 Stevens 提出來的心理物理學（psychophysics）理論，以及參考建立在這理論之上，建構整個心理轉換過程的經驗研究成果（Bolanowski and Gescheider 1991; Marks 1978; Stevens 1975/1986）。

Stevens 的心理物理學理論是由三個基礎方程式所構成。第一個方程式描述客觀存在的物理刺激對心理認知的轉換；第二個方程式描述主觀的圖像轉換爲外顯的反應。第一個方程式 $\Psi_i = aS_i^b$ 是心理物理函數，這個函數將代表著心理強度的 Ψ 連結到代表著刺激的 S；第二個方程式 $R_i = c\Psi_i^d$ 是反應函數，這個函數將代表著反應的 R 連結到主觀的經驗心理強度 Ψ，這個方程式也稱爲心理物理學的刺激反應函數。第三個基礎方程式則是上述兩個方程式的結合，也就是將心理物理函數代入反應函數中，得出 $R_i = acS_i^{bd}$ ，我們可以把新的方程式寫成

$$R_i = \alpha S_i^{\beta} \qquad (3)$$

方程式中的 β 是常數，它代表著針對不同的物理刺激所反應出來的特殊值，比方在 Stevens（1975/1986）的研究中，要求受試者對於所接受到的物理刺激給予比值的回應，結果顯示人類對於光的亮度這個刺激呈現出的 β 值是 0.33，噪音產生的 β 值是 0.66，長度與數量的刺激是 1.0，重量的刺激是 1.5 等等。同樣的，社會因素的刺激也會有它們特有的 β 值。然而，這個對於社會刺激所產生的強度的測量方法都是間接的，大部分的例子中我們無法對於社會刺激進行直接的測量，除非

airiti

我們有一個客觀的測量面向 S_i 存在，而實質薪資收入即是一個測量面向。假設受訪者要評估他們自身或是他人的薪資收入，這個評估將會是自身客觀薪資收入的函數，或是他人薪資收入的函數：

$$A_{per} = \alpha A_{obj}^{\beta} \qquad (4)$$

A_{per} 代表著對於自己的薪資收入合理與否的認知（perception），A_{obj} 則是自己客觀的實質薪資收入。其他的參數，比如 β 值在心理物理學的理論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當 $\beta<1$ 時，它決定了函數是開口朝下的曲線（concav），當 $\beta>1$ 時，整個曲線是開口朝上（convex）[3]。而 α 值則是個比較少被人重視的數值，它也是一個基礎常數。我們將上述方程式（4）取自然對數，可以得出

$$\ln(A_{per}) = \ln(\alpha) + \beta \times \ln(A_{obj}) \qquad (5)$$

我們對於參數 α 與 β 的推估，即是以方程式（5）爲基礎下進行。

參數 α 與 β 推估過程需要三種資訊：受訪者實質薪資所得、對自己應得薪資的認知與對自己合理正義薪資的認知。實質薪資所得部分是詢問受訪者平均每個月稅前收入（A_{obj}）；在應得薪資與合理正義薪資的測量則是採用間接的方式，本文所使用的資料要求受訪者對自己應得薪資的評估（A_{per_1}），從下列五個選項中選擇回應：（1）比自己應得的少很多；（2）

[3] 雖然 β 值在方程式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對於函數曲線開口朝上或是朝下則是由 β 與 α 共同決定。

airiti

比自己應得的少；（3）就是自己應得的；（4）比自己應得的多；及（5）比自己應得的多很多。同樣的，合理薪資的問題也是要求受訪者針對目前的工作收入是否合理（A_{per_2}），從下列五個選項中選擇回應：（1）比合理的要少很多；（2）比合理的少一點；（3）對我來說是合理的；（4）比合理的還多一些；及（5）比合理的多很多。做法上，我們以實質薪資收入的自然對數做爲自變數，用來解釋合理正義薪資評估的自然對數。同時我們也認爲對合理薪資的評估會因爲實質收入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實質薪資收入相對較低的受訪者對其合理薪資的評估，很有可能與實質薪資收入相對較高者的合理薪資評估不一樣。因此，我們運用應該薪資評估的結果，將樣本分爲三個群體—認爲實質薪資是剛好應得、認爲實質薪資比應得的少與認爲實質薪資比應得的薪資多，然後再運用 Tobit 模型分別處理這三個群體的合理正義薪資評估與實質薪資收入的關係。

運用 Tobit 模型估計合理正義薪資認知與實質薪資收入的關係，主要是因爲我們認爲對合理薪資的認知分佈是呈現連續性的樣態，若以上述合理薪資認知的五個選項來劃分，分佈在選項（1） 與（5）以外的資料我們就觀察不到，而觀察不到的資料不代表它們就不存在。因此，我們將合理薪資認知視爲選項（1）與（5）以外的資料是遺漏值（truncated），並運用 Tobit 模型修正這個問題。認爲實質薪資比應得薪資比少的這群人當中，運用 Tobit 模型進行合理正義薪資估算的結果爲：

$$\ln(A_{per_2}) = 0.1654 + 0.0614 \times \ln(A_{obj})$$

$$\ln(\alpha_1) = 0.1654$$

$$\therefore \alpha_1 = 1.1799$$

$$\beta_1 = 0.0614$$

airiti

認爲實質薪資等於應得薪資的這群人當中，Tobit 模型對合理正義薪資估算的結果爲：

$$\ln(A_{per_2}) = 1.0933 + 0.0095 \times \ln(A_{obj})$$
$$\ln(\alpha_1) = 1.0933$$
$$\therefore \alpha_1 = 2.9841$$
$$\beta_1 = 0.0095$$

認爲實質薪資比應得薪資比多的這群人當中，Tobit 模型對合理正義薪資估算的結果爲：

$$\ln(A_{per_2}) = 1.0120 + 0.0307 \times \ln(A_{obj})$$
$$\ln(\alpha_2) = 1.0120$$
$$\therefore \alpha_2 = 2.7512$$
$$\beta_2 = 0.0307$$

依據所獲得參數 α 與 β 的資訊，我們建構出三個合理薪資的推估方程式：

應得薪資少： $\widehat{C}_{per} = 1.1799 \times A_{obj}^{0.0614} \times 10{,}000$

應得薪資剛好： $\widehat{C}_{per} = 2.9841 \times A_{obj}^{0.0095} \times 10{,}000$

應得薪資多： $\widehat{C}_{per} = 2.7512 \times A_{obj}^{0.0307} \times 10{,}000$

這裏的 $\hat{C}$ 代表著推估的合理正義薪資。推估的合理正義薪資收入呈現在表一：[4]

---

[4] 認爲實質薪資就是應得薪資的人，其所認爲的合理正義薪資就等同於應得薪資。所以在此我們就不需要對這群人的合理薪資進推估。

airiti

表一　推估的合理正義薪資收入次數分配表

合理薪資	次數	百分比 (%)	累進百分比 (%)
19907	131	7.820	7.820
21296	120	7.160	14.99
21975	161	9.610	24.60
22434	103	6.150	30.75
22783	51	3.040	33.79
23065	28	1.670	35.46
23303	12	0.720	36.18
23509	14	0.840	37.01
23690	4	0.240	37.25
23853	5	0.300	37.55
24000	6	0.360	37.91
24134	4	0.240	38.15
24373	2	0.120	38.27
24581	2	0.120	38.39
32365	147	8.780	47.16
32706	140	8.360	55.52
32866	179	10.69	66.21
32972	148	8.840	75.04
33051	102	6.090	81.13
33114	74	4.420	85.55
33167	42	2.510	88.06
33212	23	1.370	89.43
33252	7	0.420	89.85
33287	15	0.900	90.75
33319	15	0.900	91.64
33348	3	0.180	91.82
33374	1	0.0600	91.88
33399	4	0.240	92.12
33421	5	0.300	92.42
33443	1	0.0600	92.48
33481	2	0.120	92.60
33516	3	0.180	92.78
33596	3	0.180	92.96
33703	5	0.300	93.25
35721	35	2.090	95.34
36945	8	0.480	95.82
37528	16	0.960	96.78
37917	12	0.720	97.49
38210	7	0.420	97.91
38446	10	0.600	98.51
38644	3	0.180	98.69
38813	4	0.240	98.93
39096	7	0.420	99.34
39216	3	0.180	99.52
39325	2	0.120	99.64
39426	2	0.120	99.76
39606	2	0.120	99.88
40690	2	0.120	100
Total	1,675	100	

資料來源：傅仰止（2016）。

airiti

我們獲得推估出來受訪者認知的合理正義薪資（$\hat{C}$）資訊，同時也有個人的實質薪資所得資料（A_{obj}）；因此，對薪資所得的正義評價（$J = \ln\ [\frac{A_{obj}}{\hat{C}}]$）就可以計算出來。

估算後的台灣民眾薪資正義認知的分佈情況呈現在表二。表二資料顯示在所有受薪的台灣民眾中，約 46% 的民眾認爲自己的薪資低於自己的預期，是不正義的低度報酬，這個比例是相當高的。相對的，約有 44% 的民眾認爲自己的薪資待遇高於自己的預期，屬於不正義的高度報酬。然而只有約 10% 的民眾認爲自己的薪資是完全正義，自己的付出與預期的報酬一致。

表二　薪資正義評價次數分配表

正義評價	次數	百分比 (%)	累計百分比 (%)
-1.966	35	2.090	2.090
-1.868	147	8.780	10.87
-1.382	131	7.820	18.69
-0.901	8	0.480	19.16
-0.780	140	8.360	27.52
-0.406	16	0.960	28.48
-0.350	120	7.160	35.64
-0.274	179	10.69	46.33
-0.0801	12	0.720	47.04
0.0597	148	8.840	55.88
0.129	161	9.610	65.49
0.164	7	0.420	65.91
0.309	102	6.090	72
0.358	10	0.600	72.60
0.445	103	6.150	78.75
0.507	74	4.420	83.16

airiti

0.520	3	0.180	83.34
0.659	4	0.240	83.58
0.673	42	2.510	86.09
0.681	51	3.040	89.13
0.815	23	1.370	90.51
0.869	28	1.670	92.18
0.888	7	0.420	92.60
0.939	7	0.420	93.01
0.985	3	0.180	93.19
1.026	12	0.720	93.91
1.049	15	0.900	94.81
1.073	2	0.120	94.93
1.148	15	0.900	95.82
1.154	2	0.120	95.94
1.160	14	0.840	96.78
1.238	3	0.180	96.96
1.278	4	0.240	97.19
1.298	2	0.120	97.31
1.321	1	0.0600	97.37
1.382	5	0.300	97.67
1.397	4	0.240	97.91
1.468	5	0.300	98.21
1.476	6	0.360	98.57
1.534	1	0.0600	98.63
1.561	4	0.240	98.87
1.654	2	0.120	98.99
1.712	2	0.120	99.10
1.761	3	0.180	99.28
1.841	2	0.120	99.40

airiti

2.007	3	0.180	99.58
2.152	2	0.120	99.70
2.340	5	0.300	100
總計	1,675	100	

資料來源：傅仰止（2016）。

本研究使用到的主要分析變項是年齡群與經濟出生世代。[5] 另外，出生世代是指在某個時期出生，經歷類似歷史事件，而且具有共同記憶的一群人，因此同一個出生世代可以包含好幾個年齡群組。[6] 表三呈現年齡群與經濟世代的樣本分佈，表中可以看到相同年齡層的受訪者可能分屬在不同經濟世代，這樣的資料類型適合運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進行分析（Raudenbush and Bryk 2002）。另外，本文使用其他分析變項有性別（1 = 男性，0 = 女性）、婚姻狀況（分爲有婚姻關

[5] 本文將年齡群體分爲每五歲一組共計 14 組，分別爲 20～24 歲，25～29 歲，30～34 歲，35～39 歲，40～44 歲，45～49 歲，50～54 歲，55～59 歲，60～64 歲，65～69 歲，70～74 歲，75～79 歲 ，80～84 歲及 85 歲以上等等。

[6] 本文將前述六個經濟世代操作化時依據其時代特徵，大致以 7～14 年爲界與 14 個年齡群組對應如下：（1）日治時期殖民地經濟世代：早於 1925 年之前出生，於 1945 年之前已滿二十歲，在 2010 年時是 85 歲以上的受訪者；（2）戰後經濟重建時期是 1945 年到 1952 年間，這時期出生世代是 1925 年以後出生，於 1945 年後陸續滿二十歲，在 2010 年時是 77～84 歲的受訪者；（3）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是 1953 年到 1960 年間，這時期出生世代是 1932 年以後出生，於 1952 年以後陸續滿二十歲，在 2010 年時是 68～76 歲的受訪者；（4）出口導向外資湧進時期是 1961 年到 1973 年，這時期出生世代是 1940 年以後出生，於 1960 年以後陸續滿二十歲，在 2010 年時是 54～67 歲的受訪者；（5）工業升級經濟奇蹟時期是 1974 年到 1988 年間，這時期出生世代是 1953 年以後出生，於 1973 年以後陸續滿二十歲，在 2010 年時是 38～53 歲的受訪者；（6）經濟全球化與民主轉型時期是 1988 年之後，這時期出生世代是 1968 年以後出生，於 1989 年以後陸續滿二十歲，在 2010 年時是 20～37 歲的受訪者。

airiti

係與無婚姻關係）、教育程度（以教育年限爲測量標準）、族群（本省閩南、本省客家、大陸各省市及原住民）[7] 以及受訪者主觀的社會階級認定（1 = 下層階級、2 = 勞工、3 = 中下階級、4 = 中層階級、5 = 中上層及 6 = 上層階級）。有關於這些基本變項和薪資正義評價的描述性分析呈現在表四。

表三　年齡與經濟世代之人數交叉表

年齡層 (Age)	經濟世代 (Cohort)						總計
	1	2	3	4	5	6	
20-24	0	0	0	0	0	180	180
25-29	0	0	0	0	0	171	171
30-34	0	0	0	0	0	181	181
35-39	0	0	0	0	73	90	163
40-44	0	0	0	0	193	0	193
45-49	0	0	0	0	180	0	180
50-54	0	0	0	35	136	0	171
55-59	0	0	0	145	0	0	145
60-64	0	0	0	83	0	0	83
65-69	0	0	18	36	0	0	54
70-74	0	0	58	0	0	0	58
75-79	0	30	21	0	0	0	51
80-84	0	33	0	0	0	0	33
≥85	12	0	0	0	0	0	12
總計	12	63	97	299	582	622	1,675

資料來源：傅仰止（2016）。

[7] 其他移民人口在樣本中太少，所佔的比例是 0.69%，在分析時會導致統計效果不穩定，因此從統計模型的樣本中刪除，其餘族群則以虛擬變數來處理。

airiti

表四　主要變項敘述統計

變數	N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脈絡變數：					
年齡群	14	5.524	3.221	1	14
經濟世代	6	4.936	1.110	1	6
個人層次變數：					
正義評價 (J)	1,675	-0.191	0.872	-1.966	2.340
男性	1,675	0.500	0.500	0	1
已婚	1,675	0.606	0.489	0	1
教育年限	1,674	11.47	4.256	0	27
主觀社會階級	1,673	2.815	1.130	1	6
本省閩南	1,661	0.741	0.438	0	1
本省客家	1,661	0.117	0.321	0	1
大陸各省市	1,661	0.122	0.327	0	1
原住民	1,661	0.0205	0.142	0	1

資料來源：傅仰止（2016）。

三、模型建構

本文感興趣的問題是：在經歷不同歷史經驗與集體記憶的台灣世代，對於以薪資收爲主的分配正義感受否會有不同的看法？能夠呈現世代效果的個人層次 panel data 最適合用來回答這些問題，但是個人層次的 panel data 最大的問題是樣本會隨著時間而流失，這會產生嚴重的選擇性偏差。同時，實務上我們也不容易能找到適合本研究的 panel data ，故以抽樣調查資料作爲主要分析資料。然而，必須注意的是，若運用橫斷面資料（cross-sectional data）進行個人層次的迴歸分析，將總體與個體變數置放於同一個方程式中（如個人層次的性別、年齡、族群與總體層次的世代與年齡層），這個方法忽略了能夠被世代所解釋的總體層次的變異量。另外，若運用總體層

airiti

次的分析，也就是將所以個體層次的變數轉變爲團體平均數（如，不同世代的平均教育年限、平均年齡等），這個做法則會降低個體層次變數對結果的解釋能力。爲了克服這些問題，Yang and Land（2006; 2008; 2013）提出年齡、時期、世代分析方法（age-period-cohort analysis），做法上是將不同時間點的橫斷面資料整合起來，建構一個有時期、年齡與世代的三維面向的大型長期資料，這樣的做法能檢視有興趣的變數在變遷趨勢中的年齡、世代和時期效應。然而社會不平等調查訪問計劃只在臺灣執行過一次，受到資料的限制，在無法建構時期、年齡與世代的三維面向長期資料的情況下，本文運用單一時間點的橫斷面資料，採用 Raudenbush and Bryk（2002）提出的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 CCREM）進行靜態的世代效果分析，而缺點是年齡群與出生世代的動態變遷趨勢就無法呈現出來。

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是一種多層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ing）的概念，個人置身（nested）於更高層次的脈絡結構內，就如同學生置身於學區內，公民置身於國家內一樣，如此身處第一層的個人與第二層總體脈絡變數就形成一個多層次的結構。分析策略上本文將出生世代與年齡群視爲第二層的脈絡變數，個人層次的受訪者可同時被年齡與世代這兩個更高層次的脈絡變數來分類，而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特別適合用來分析表二所呈現的這類型的資料。這樣的分析方法能夠讓我們更精確地檢視年齡與世代的效果，同時也可以解決年齡與世代共線性的問題。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不僅可以讓研究者區別出依變數在經濟世代間、年齡群組間、與個人受訪者間的變異量，而且也可以標示出在個人層次中與依變數有關的出生世代與年齡群組特質（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爲了估計在世代間、年齡層之間與群落（cells）內所有受

airiti

訪者間的變異量，分析模型採用多層次的建構方式，第一層呈現個人變數的效果，模型建構如下：

個人層次：

$$Y_{ijk} = \pi_{0jk} + \pi_{1jk}(\textit{男性})_{ijk} + \pi_{2jk}(\textit{已婚})_{ijk} + \pi_{3jk}(\textit{教育年限})_{ijk} + \pi_{4jk}(\textit{主觀社會階級})_{ijk} + \pi_{5jk}(\textit{本省客家})_{ijk} + \pi_{6jk}(\textit{大陸各省市})_{ijk} + \pi_{7jk}(\textit{原住民})_{ijk} + e_{ijk} \quad (6)$$

Y_{ijk} 是指第 i 個受訪者在第 j 個年齡群組與第 k 的經濟世代中的薪資正義認知；π_{0jk} 是指年齡群組 j 與經濟世代 k 所構成的群落（cell）中的所有受訪者的正義認知評價平均值，也就是在身處年齡群組 j 並同時屬於經濟世代 k 這群受訪者的正義認知平均值；

$(\textit{解釋變項})_{ijk}$ 是第 i 個受訪者在第 j 個年齡群組與第 k 的經濟世代中的解釋變項特質；

$\pi_{1jk} \sim \pi_{7jk}$ 是指解釋變項的迴歸係數；

e_{ijk} 是群落內（within-cell）的隨機效果，指涉的是受訪者 $_{ijk}$ 的公平認知與解釋變項爲基礎所估計出來的正義評價兩者之間的差距。這隨機效果假定是常態分佈，$e_{ijk} \sim N(0, \delta^2)$。

i,j,k 分別代表著受訪者、年齡群組、與經濟世代，他們的範圍是

$i = 1,\cdots, n_{jk}$，受訪者在群落 jk；

$j = 1,\cdots, J = 14$ 個年齡群組；與

$k = 1,\cdots, K = 6$ 個經濟世代。

第二層的模型建構主要是針對截距 π_{0jk} 與解釋變項的係數，爲了模型的簡約性（parsimony），除了教育年限加入年齡隨機效果外，筆者將所有第一層迴歸係數以固定效果處理。本文將教育年限對薪資正義認知的評估在年齡上視爲隨

airiti

機效果，是受到過去文獻論點的啓發（吳親恩 2017；林宗弘 2015；熊瑞梅 2010 等人）。例如，吳親恩（2017）的研究指出年輕人對於發展機會多寡與正義的評價顯著地低於年長者；許多文獻中也強調國家高等教育擴張會影響民眾對政治、經濟與社會平等的認知。另外，在探索性的統計分析上，本文試圖檢視教育年限與年齡對薪資正義評估的影響是否有顯著的交互作用，結果發現教育年限對薪資正義評估的效應不是固定的，而是會隨著年齡而變化。所以在分析模型的設定上，才會將教育年限對薪資正義評估的效應在年齡上視爲隨機效果。[8] 第二層模型建構如下：

第二層次：

$$
\begin{aligned}
\pi_{0jk} &= \theta_0 + b_{00j} + c_{00k} \\
\pi_{1jk} &= \theta_1 \\
\pi_{2jk} &= \theta_2 \\
\pi_{3jk} &= \theta_3 + b_{30k} \\
\pi_{4jk} &= \theta_4 \\
\pi_{5jk} &= \theta_5 \\
\pi_{6jk} &= \theta_6 \\
\pi_{7jk} &= \theta_7
\end{aligned}
\tag{7}
$$

θ_0 是指所有受訪者薪資正義認知的平均值；

[8] 過去文獻也指出「主觀社會階級」會影響民眾對於薪資正義評估，而它的效應也可能會隨著年齡層而有所差異。在探索性的統計分析上，本文發現「主觀社會階級」對於薪資正義評估的影響不是固定的，會隨著年齡層差異而變化。另外，本文也發現「男性」對於薪資正義評估會和年齡產生顯著的交互作用效應。然而在模型設定上，本文並沒將「主觀社會階級」與「男性」視爲對年齡的隨機效果，主要是因爲高等教育的擴張會使得愈來愈多的民眾自認爲是中產階級，教育年限和主觀社會階級認知有某種程度的共線性。基於模型的簡約原則，本文只針對和年齡有最大的隨機效應變數，即教育年限設定爲隨機效果。

airiti

b_{00j} 是年齡 j 隨機的主要效果，也就是年齡 j 對所有經濟世代的平均影響力，假定它是常態分佈；

c_{00k} 是世代 k 隨機的主要效果，也就是世代 k 對所有年齡群組的平均影響力，假定它是常態分佈。

將第二層的方程式（7）代入第一層方程式（6）中，合併後的結果稱之爲混合模型（mixed model），其模型如下：

混合模型：

$$\begin{aligned} Y_{ijk} = {} & \theta_0 + \theta_1 (\textit{男性})_{ijk} + \theta_2 (\textit{已婚})_{ijk} + \theta_3 (\textit{教育年限})_{ijk} \\ & + \theta_4 (\textit{主觀社會階級})_{ijk} + \theta_5 (\textit{本省客家})_{ijk} \\ & + \theta_6 (\textit{大陸各省市})_{ijk} + \theta_7 (\textit{原住民})_{ijk} \\ & + b_{00j} + b_{30j} (\textit{教育年限})_{ijk} + c_{00k} + e_{ijk} \end{aligned} \quad (8)$$

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提供了分析上的優勢，這個方法不僅能夠分析個人特質與正義評價之間的關係隨著年齡與世代不同的變化程度，同時也能夠檢視世代對不同年齡層的影響程度（以及年齡層對不同世代間的影響程度），而且也能估計年齡與世代的隨機效果（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伍、研究發現

表五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來估計民眾對薪資正義認知的個人層級固定效果係數與年齡層級的隨機效果變異量。表五中的原始模型只有估計經濟世代與年齡群組等脈絡變數對民眾薪資公平認知的影響，這樣的分析可以讓我們估計三種有興趣的相關性：個別年齡群組內、個別世代內、以及個別群落內的相關性。個別年齡群組內的相關是指屬於同一個年齡群組但是歸屬於不同的經濟世代的兩位受訪者正義認知之間的相關

airiti

性，其相關係數是 0.2，[9] 也就是約有 20% 的正義認知總變異量是落在年齡群組間。同樣的，個別經濟世代內的相關性是指屬於同一個經濟世代但是分屬於不同年齡群組的兩位受訪者正義認知之間的相關性，其相關係數是 0.1。[10] 換言之，約有 10% 的正義認知總變異量是落在經濟世代間。最後，同時屬於同一個年齡群組與同一個經濟世代的兩位受訪者的正義認知之間的群落內的相關係數是是 0.3。[11] 因此，根據表四原始模型的估計，約有 30% 的總變異量是落在群落之間。原始模型的結果顯示，在沒有任何解釋變項的情況下，年齡效果、經濟世代與個人效果的隨機變異量分別爲 0.145、0.059 以及 0.588；其中，經濟世代與年齡層對民衆薪資正義認知都具有顯著影響力。

表五的模型 2 加入了男性、已婚、教育年限、受訪者主觀社會階級以及族群等個人層次的解釋變項，所有的變項皆設定在（$X_{ij} - \bar{X}$）進行估計。[12] 與原始模型比較，我們發現模型 2 的適合度（goodness of fit）比較好。模型 2 加入了解釋變項後，個人效果的變異量由 0.588 下降至 0.473 ，這些解釋變項

---

[9] 相關係數的計算公式是：

$$\widehat{corr}\,(Y_{ijk}，Y_{i'jk'}) = \frac{\widehat{\tau_{b00}}}{\widehat{\tau_{b00}} + \widehat{\tau_{c00}} + \widehat{\sigma^2}} = \frac{0.145}{0.145 + 0.059 + 0.588} = 0.2$$

[10] 相關係數的計算公式是：

$$\widehat{corr}\,(Y_{ijk}，Y_{i'jk'}) = \frac{\widehat{\tau_{b00}}}{\widehat{\tau_{b00}} + \widehat{\tau_{c00}} + \widehat{\sigma^2}} = \frac{0.059}{0.145 + 0.059 + 0.588} = 0.1$$

[11] 相關係數的計算公式是：

$$\widehat{corr}\,(Y_{ijk}，Y_{i'jk'}) = \frac{\widehat{\tau_{b00}}}{\widehat{\tau_{b00}} + \widehat{\tau_{c00}} + \widehat{\sigma^2}} = \frac{0.145 + 0.059}{0.145 + 0.059 + 0.588} = 0.3$$

[12] 在進行多層次模型的估計時，爲了確保模型估計能得出穩定的數值，個人層次的解釋變項所集中的位置（location）就變得很重要。一般在進行層級線型模型分析時，解釋變項位置的設定有三種：集中在全體樣本平均值（centering around the grand mean）、集中在樣本中特定群體的平均值（centering around the group mean）以及集中在其他位置。本文將所有解釋變數設定在 centering around the grand mean。

airiti

解釋了個人效果變異量達 0.115 個單位。另外，模型 2 中，世代的隨機效果減少（變異量從 0.059 降到 0.000）；同樣的，年齡的隨機效果也減低（變異量從 0.145 減為 0.114），這表示在加入固定效果的解釋變數後，民眾的薪資正義認知因年齡與出生世代所造成的波動減少。放入解釋變數後，模型 2 中的年齡對民眾薪資正義評價的效果仍然是顯著的，但出生世代對民眾正義評價則變得不顯著，表示年齡的效果比出生世代更具有影響力。

表五　正義評價的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

	模型 1 原始模型		**模型 2 條件模型 教育年限 固定效果**		**模型 3 條件模型 教育年限 依年齡隨機變動**	
固定效果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截距	-0.432**	0.148	-0.275**	0.094	-0.365**	0.138
男性			0.307***	0.035	0.287***	0.035
已婚			0.143**	0.044	0.120**	0.043
教育年限			0.064***	0.006	0.054***	0.013
主觀社會階級			0.104***	0.017	0.098***	0.017
本省客家			0.027	0.055	0.042	0.054
大陸各省市			0.156**	0.054	0.139*	0.055
原住民			0.164	0.124	0.163	0.123
	變異量		**變異量**		**變異量**	
年齡效果 $\begin{pmatrix} var(b_{00j}) & cov(b_{00j}, b_{30j}) \\ cov(b_{30j}, b_{00j}) & var(b_{30j}) \end{pmatrix}$	0.145***		0.114***		$\begin{pmatrix} 0.071*** & 0.010 \\ 0.010 & 0.002*** \end{pmatrix}$	
世代效果	0.059**		0.000		0.071***	
個人效果	0.588		0.473		0.460	
離異數(Deviance)	3877.38		3508.34		3474.12	
自由度	4		11		13	
樣本數	1658		1658		1658	

資料來源：傅仰止（2016）。

airiti

模型 2 中的固定效果的解釋變項呈現出相對於女性，男性有更高的薪資正義評價；有婚姻關係的民眾比沒有婚姻關係的民眾有更高的薪資正義評價；民眾的教育年限愈高，認爲自己的薪資愈公平；民眾自我認知的社會階級愈高，愈覺得自己的薪資是公平的；大陸各省市民眾顯著地比本省閩南人有更高的薪資正義認知。模型 3 將教育年限對薪資正義認知的影響在年齡上視爲是隨機效果，年齡與世代的效果仍然是顯著的。與模型 2 相較，我們發現模型 3 的適合度更好。在模型 3 中，個人層次的變異量下降至 0.46，也就是模型 3 中加入了教育年限依年齡隨機變動效果後，個人層次的變異量下降了 0.013（0.473-0.460）個單位。另外，在模型 3 中，將教育年限依著年齡隨機變化使得出生世代的隨機效果增加了（變異量從 0.000 上升到 0.071）；相反的，年齡的隨機效果減低（變異量從 0.114 減爲 0.071），這表示在加入教育年限隨著年齡變化的隨機效果後，民眾的薪資正義認知因出生世代所造成的波動會增加，而年齡所造成的影響會減少；主要原因是年齡與教育年限呈現出高度相關，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年輕的民眾受教育的年限會比年長的民眾來得長。模型 3 的固定效果解釋變數，幾乎與模型 2 相似，所不同的是雖然大陸各省市民眾對薪資正義認知的效果依然顯著，但其影響力降低了。

圖一呈現的是每個年齡群組的薪資正義認知平均值與所有受訪者薪資正義認知平均值的距離分佈。[13] 圖一的結果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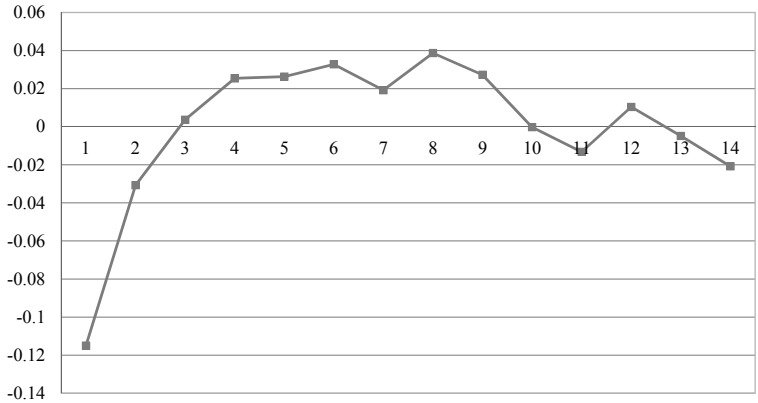
---

[13] 圖一與圖二中的殘差值（residuals）皆是以經驗貝氏（Empirical Bayes）估計法計算得出。貝氏方法是將過去經驗作爲先驗資訊（Prior Information），結合本次蒐集的資料， 綜合之後獲得新的驗後結果（Posterior）。在實際應用時，貝氏方法可將過去經驗或是其他相關研究的結果視爲先驗資訊。而本文所採用的經驗貝氏估計，做法上是將資料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用於估計先驗分配（Prior Distribution）。運用 MCMC 貝氏計算方法，透過多次遞迴的電腦模擬，估計出參數的驗後分

airiti

薪資公平認知在年齡群組上的分佈趨勢展現了生命週期的效果，也就是年輕時對自己的薪資收入感到很不滿意，但隨著年齡與工作經驗的增長，對自己的薪資收入的感受漸漸覺得合理。在所有年齡層中，20-29 歲這個年齡層的民眾對自己薪資的認知覺得不合理與不公平，其中又以 20-24 歲年齡層的民眾對自己的薪資收入最不滿意。當臺灣民眾過了 30 歲以後，對自己薪資的滿意程度開始呈現正向趨勢；在 35 歲以後，臺灣民眾的薪資滿意程度進入高原期，薪資正義認知還是處於正向的評價而且維持穩定持平的發展；直到 60 歲以後進入退休階段，薪資公平認知開始下降；在 65 歲以後的臺灣民眾薪資公平認知維持在 0 左右，此時的民眾對可支配所得沒有特別的感覺，不覺得目前生活津貼是過高或是過低。

圖一　薪資正義評價在年齡群組上的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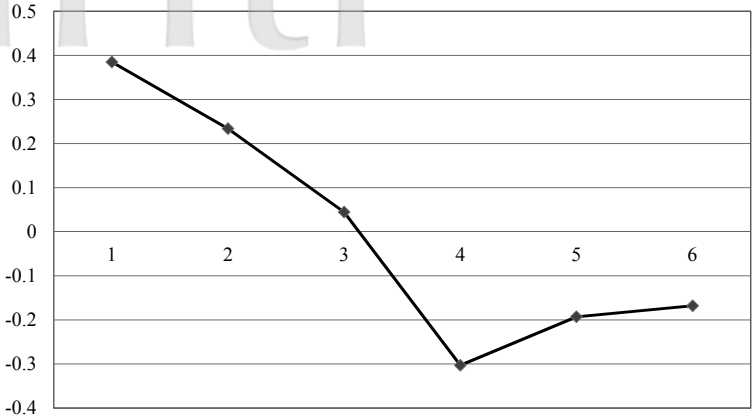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傅仰止（2016）。

配（Posterior Distribution）。MCMC 使用 Markov Chain 從某個分配（驗後分配）中產生亂數（抽樣），再以這些樣本估計期望值、變異數等參數。

airiti

圖二　薪資正義評價在經濟世代上的分佈



資料來源：傅仰止（2016）。

圖二呈現的趨勢則是薪資正義認知在不同經濟世代上的分佈。根據圖二的結果，不同經濟世代的薪資正義評價呈現出兩個集團，第一、二、三經濟世代的民眾對自己薪資收入的感受是正向評價；相對的，第四、五、六經濟世代對自己的薪資收入普遍感到不滿意。有趣的是，雖然有人說戰後嬰兒潮掌握了政治與經濟權力來壓迫年輕世代，但是圖二屬於戰後嬰兒潮的第四經濟世代（50～69 歲這個年齡層的臺灣民眾）反而呈現出的薪資正義認知是最低的。不同世代之間政治與經濟權力的壓迫，並沒有反應在薪資正義認知上。換言之，不同出生世代之間的薪資公平認知差異可能不是來自於世代間的政治與經濟壓迫，而是來自於對外在經濟結構環境的反應。例如，50～69 歲屬於第四經濟世代的民眾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以及產業結構升級所帶來的轉職、轉業或技能提升的問題，爲了工作他們得委屈求全或是得離開就業市場，這直接衝擊到他們的薪資結構與合理薪資認知。相對的，70 歲以上的第一到第三經濟世代的民眾多半已經退休，外在產業結構的變化對他們的衝擊相對就比較小。然而，這樣的假說還需要進一步的驗證。

airiti

陸、結論與限制

本文對於世代的劃分是著眼於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成年的民眾，因爲身處特定的經濟、政治與社會脈絡下，他們的集體記憶也會有所差異。以經濟發展爲劃分基礎，主要是因爲本文關心的分配正義是以薪資爲判準的標的。過去的研究發現，人們對正義的關心與社會中資源的富足有關。一個資源與機會都很富足的社會，正義的關注通常不是人們生活中的重要議題（Hogan and Emler 1981），但是當社會上的資源雖然不是最豐富，但也不是完全都沒有時，在分配上會有些人拿得多，有些人拿得少，這時候人們對正義的關注就開始變得愈來愈重要。近十幾年來，台灣社會薪資結構普遍呈現低檔狀態，貧富差距擴大，社會上出現世代不正義的聲音，戰後嬰兒潮掌控政治權力與金錢遊戲，壓迫年輕世代延長工時、壓低其福利與工資等等說法。這樣年長與年輕世代簡單二分的做法來分析世代正義，討論上並無法讓我們瞭解世代正義的全貌。本文以經濟發展階段作爲世代的劃分基礎，運用薪資正義認知的經驗性資料來檢視世代之間對分配正義的認知。方法上本文運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來緩解因年齡與世代兩者高度共線關係所導致估計值失眞的問題。

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的估計結果發現，年齡與世代的確影響了民眾對薪資正義的認知。當我們將教育年限視爲是個人層次的固定效果時，年齡對薪資正義認知的影響遠大於世代的效果；但是受到高等教育擴張的影響，年齡與教育年限呈現高度相關。因此，當我們將教育年限視爲是依著年齡而隨機變化時，世代效果影響力上升，年齡效果的影響力下降，兩者的影響力趨於一致。根據這樣的結果，本文認爲在控制其他個人層次的變數後，薪資正義認知不但具有世代之間的差異，同時在年齡群組上也呈現出明顯的不同。其次，個人層次解釋變數

airiti

的效果上，本文發現男性、有婚姻關係、高教育年限、自認爲是上層社會階級、以及大陸各省市族群對自身薪資正義認知較高。換言之，這些在傳統上屬於社會優勢族群，普遍認爲自己的薪資收入高於自己預期的薪水。這些社會優勢族群在資源與機會的取得上具有優勢，產生的結果就直接反應在對自身薪資收入的感受。在某個程度上，薪資正義認知反映了資源與機會在不同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間不公平的分佈與配置的狀況。

另外，根據圖一與圖二的結果，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的運用某個程度上能有效地將生命週期與世代效果區分出來。20～29 歲年齡層的民衆是「薪情」最不美麗的一群，他們對自己的薪資條件最不滿意；30 歲以後才漸漸地滿意自己的薪資，而薪資滿意程度穩定地維持到他們退休前；當 65 歲退休以後，民衆對薪資（退休金、生活津貼）的感覺則沒有什麼特別滿意或不滿意的。相對的，不同經濟世代間的薪資公平認知，呈現出兩極的發展。年長的第一、第二、第三經濟世代民衆對薪資的評價是傾向正面的；第四、第五、第六經濟世代民衆的薪資公平認知則是普遍是負面的。這樣一個世代正義的樣態，或許不是掌握政治與經濟權力的世代壓迫年輕世代的結果，而是有可能民衆對經濟全球化下，產業結構轉變造成薪資結構變化的反應。至於經濟結構轉變與薪資正義認知兩者間的關係，本文因爲資料的侷限，無法進一步的來分析檢視。

本研究受限於單一時間點橫斷面資料的侷限性，無法回答薪資正義認知在世代、年齡層與制度變遷之間的趨勢與走向。換言之，因爲沒有多個時間點橫斷面資料的集合，本文無法回答民主轉型前與轉型後民衆的分配正義觀點的變化。例如，經歷過民主轉型的中歐、東歐與台灣新興民主國家的人民在威權統治結束後，這些國家如何適應新建立的自由民主制度與自由

airiti

市場經濟。是舊的計劃經濟的正義信念持續存在，還是新的自由市場的公平信念被人民廣爲接受？對於新的政經體制的支持是否能維持，或者對新體制的支持會受到經濟困境的影響而削弱？這些是重要而且值得細究的問題， 期待日後資料的可獲得性能減緩研究的侷限。

airiti

參考文獻

王靖興、孫天龍，2005，〈臺灣民眾民主政治評價影響因素之分析〉，《臺灣民主季刊》，2（3）：55-79。Wang, Ching-hsing, and Tien-long Shun. 2005. “Taiwan minzhong minzhu zhengzhi pingjia yingxiang yinsu zhi fenxi” [An Analysis of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eople’s Evaluation of Taiwan’s Democracy].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2(3): 55-79.

吳乃德，2005，〈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臺灣政治學刊》，9（2）：5-39。Wu, Nai-the. 2005. “Mianbao yu aiqing: Chutan Taiwan minzhong minzu rentong de biandong” [Romance and Bread: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Identity Change in Taiwan].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5-39.

吳親恩，2017，〈影響台灣民眾公平正義與發展機會評估的因素〉，《臺灣民主季刊 》，14（3）：1-44。Wu, Chin-en. 2017. “Yingxiang Taiwan minzhong gongping zhengyi yu fazhan jihui pinggu de yinsu” [Causes of Taiwanese People’s Evaluations on Social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Taiwan Demoncracy Quarterly* 14(3): 1-44.

林宗弘，2015，〈再探臺灣的世代政治：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的應用，1995-2010〉，《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7（2）：395-436。Lin, Thung-hong. 2015. “Zaitan Taiwan de shidai zhengzhi: jiaocha fenlei suiji xiaoying moxing de yong, 1995-2010” [Generational Politics in Taiwan Revisited:

airiti

Application of a 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 1995-2010].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7(2): 395-436.

崔曉倩、吳重禮，2011，〈年齡與選舉參與：2008年總統選舉的實證分析〉，《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26）：7-44。Tsui, Hsiao-chien, and Chung-li Wu. 2011. "Nianling yu xuanju canyu: 2008 nian zongtong xuanju de shizheng" [Age and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Survey Research-Method and Application* (26): 7-44.

張佑宗，2011，〈選舉結果、政治學習與民主支持－兩次政黨輪替後台灣公民在民主態度與價值的變遷〉，《臺灣民主季刊》，8（2）：99-137。Chang, Yu-tzung. 2011. "Xuanju jieguo, zhenzhi xuexi yu minzhu zhichi: liangci zhengdang lunti hou Taiwan gongmin zai minzhu taidu yu jiazhi de bian qian" [Electoral Outcomes, Political Learning, and Support for Democracy: Changes in Citizens' Attitudes towards Democracy in Taiwan after the Year 2000].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8(2): 99-137.

盛杏湲，201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定群追蹤資料的應用〉，《選舉研究》，17（2）：1-33。Sheng, Shing-yuan. 2010. "Taiwan xuanmin zhengdang renton de wending yu bianqian: dingqun zhuizong ziliao de y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mong Taiwanese Voters: A Panel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7(2): 1-33.

許耿銘、紀駿傑、蕭新煌，2016，〈氣候變遷、世代正義與

airiti

永續性：概念、指標與政策〉，《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6（2）：259-285。Hsu, Keng-ming Hsu, Chun-chieh Chi, and Michael Hsin-huang Hsiao. 2016. “Qihou bianqian, shidai zhengyi yu yongxuxing: gainian, zhibiao yu zhengce” [Climate change,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and sustainability: concept, indicators, and policy]. *Taiwan Economic Forecast and Policy* 46(2): 259-285.

陳光輝，2010，〈民主經驗與民主價值－兩個世代台灣大學生之比較〉，《臺灣民主季刊》，7（4）：1-45。Chen, Kuang-hui 2010. “Minzhu jingyan yu minzhu jiazhi: liangge shidai Taiwan daxuesheng zhi bijiao” [Democratic Experienc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Comparing Two Generation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wan].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7(4): 1-45.

陳陸輝，200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7（2）：109-141。Chen, Lu-huei. 2000. “Taiwan xuanmin zhengdang rentong de chixu yu bianqi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mong the Electorate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7(2): 109-141.

陳陸輝，2003，〈政治信任、施政表現與民眾對台灣民主的展望〉，《臺灣政治學刊》，7（2）：149-188。Chen, Lu-huei. 2003. “Zhengzhi xinren, shizheng biaoxian yu minzhong dui Taiwan minzhu de zhanwang” [Political Trust,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the Perspective of Deepening Democracy among the Electorate in Taiwan].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2): 149-188.

airiti

傅仰止，2016，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09第五期第五次：社會不平等組（C00157_1）【原始數據】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doi:10.6141/TW-SRDA-C00157_1-1。Fu, Yang-chih. 2016. *Taiwan shehui bianqian jiben diaocha jihua 2009 di wuqi di wuci: shehui bu pingdeng zu*. [*2009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Round 5, Year 5): Social Inequality (C00157_1)*][data file]. Available from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Academia Sinica. doi:10.6141/TW-SRDA-C00157_1-1

游清鑫、蕭怡靖，2007，〈以新選民的政治態度論台灣民主政治的未來〉，《臺灣民主季刊》，4（3）：109-51。Yu, Ching-hsin, and Yi-ching Hsiao. 2007. “Yi xin xuanmin de zhengzhi taidu lun Taiwan minzhu zhengzhi de weilai” [New Voter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the Future of Taiwan’s Democracy].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4(3): 109-51.

黃忠正，2012，〈論世代正義〉，《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50（3)：185-209。Huang, Chung-cheng. 2012. “Lun shidai zhengyi” [On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0(3): 185-209.

黃信豪，2011，〈民主態度的類型：台灣民眾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分析〉，《選舉研究》， 18 (1)：1-34。Huang, Hsin-hao. 2011. “Minzhu taidu de leixing: Taiwan minzhong erci zhengdang lunti hou de fenxi” [Constructing a Typology of Popular Attitudes to Democracy: An Analysis after the Second

airiti

Party Altern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8(1): 1-34.

黃寄倫、冷則剛、林煥笙，2016，〈世代正義的政策意涵分析〉，《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6（2）：185-207。Huang, Gillan Chi-lun, Tse-kang Leng, and Huan-sheng Lin. 2016. “Shidai zhengyi de zhengce yihan fenxi”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Taiwan Economic Forecast and Policy* 46(2): 185-207.

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2010，〈解嚴後民眾社團參與的變遷：時期與世代的效應與意涵〉，《臺灣社會學刊》，（44）：55-105。Hsung, Ray-may, Feng-bin Chang, and Ya-feng Lin. 2010. “Jieyan hou minzhong shetuan canyu de bianqian: shiqi yu shidai de xiaoying yu yihan” [Changes in Participation in Post-Martial Law Voluntary Associations: Effects and Implications of Period and Cohort].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55-105.

蕭代基、顧林，2016，〈跨世代議題的經濟與政策意涵〉，《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6（2）：243-257。Shaw, Dai-gee, and Lin Ku. 2016. “Kuashidai yiti de jingji yu zhengce yihan” [Theori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i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Taiwan Economic Forecast and Policy* 46(2): 243-257.

蕭阿勤，2010，《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Hsiau, A-chin. 2010. *Huigui xianshi: Taiwan 1970 niandai de zhanhou shidai yu wenhua zhengzhi bianqian*. [*Return to*

airiti

realit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1970s Taiwan and postwar genera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戴華，2016，〈我們和未來世代之間的道德關係：跨世代正義如何可能？〉，《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6（2）：159-184。Tai, Hua. 2016. "Women he weilai shidai zhijian de daode guanxi: kua shidai zhengyi ruhe keneng?" [Our moral relation to future generations: on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Taiwan Economic Forecast and Policy* 46(2): 159-184.

瞿宛文，2007，〈台灣戰後經濟發展與民主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5）：183-189。Chu, Wan-wen. 2007. "Taiwan zhanhou jingji fazhan yu minzhu yundong" [Taiwan's Post-wa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Movement].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of Social Studies* (65): 183-189.

瞿宛文，2011，〈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台灣發展型國家的不成功轉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4）：243-288。Chu, Wan-wen. 2011. "Minzhuhua yu jingji fazhan: Taiwn fazhanxing guojia de buchenggong zhuanxing"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Un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Developmental State].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of Social Studies* (84): 243-288.

Barry, Brian. 1978. "Circumstances of justice and future generations." In *Obligations to Future Generations*, eds. B. Barry and R. I. Sikora.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airiti

Press.

Bartels, Larry M., and Simon Jackman. 2014. "A generational model of political learning." *Electoral Studies* 33: 7-18.

Bengtson, Vern L. 1993. "Is the 'contract across generations' changing?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ing on obligations and expectations across age groups." In *The changing contract across generations*, eds. V. L. Bengtson and W. A. Achenbaum. New York, NY: Aldine de Gruyter.

Bhatti, Yosef, and Kasper M. Hansen. 2012. "The effect of generation and age on turnout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How turnout will continue to decline in the future." *Electoral Studies* 31(2): 262-272.

Blais, André, Elisabeth Gidengil, and Neil Nevitte. 2004. "Where does turnout decline come fro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3(2): 221-236.

Blais, André, and Peter Loewen. 2009. *Youth electoral engagement in Canada*. Ottawa, CA: Elections Canada.

Bolanowski, SJ, and GA Gescheider. 1991. *Ratio scaling of psychological magnitude: In honor of the memory of SS Stevens*. Hillsdale, NJ: Erlbaum.

Booth, Alan. 1983. "Social responses to protracted scarcity." In *Scarce Natural Resources: The Challenge to Public Policy Makers*, eds. S. Welch and R. Miewald.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shing .

Braungart, Richard G., and Margaret M. Braungart. 1986. "Life-course and generational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airiti

12: 205-231.

Dalton, Russell J. 2013. *Citizen politics: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shing.

Daniels, Norman. 1989. "Justice and Transfers Between Generations." In *Workers versus pensioners: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n an ageing world*, eds. P. Johnson, C. Conrad and D. Thomson.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østa. 1996. "After the Golden Age? Welfare State Dilemmas in a Global Economy." In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National 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ies*, ed. G. Esping-Anderse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shing.

Eyerman, Ron, and Bryan S. Turner. 1998. "Outline of a theory of gener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1): 91-106.

Foner, Anne. 1988. "Age Inequalities: Are They Epiphenomena of the Class System?" In *Social structures and human lives*, ed. M. W. Riley, B. J. Huber and B. B. Hes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shing.

Fröhlich, Norman, and Joe A. Oppenheimer. 1990. "Choosing Justice in Experimental Democracies with Produ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2): 461-477.

Gibson-Davis, Christina M., and Christine Percheski. 2018.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Wealth Inequality Among America's Dependents." *Demography* 55(3): 1009-1032.

Güth, Werner, Rolf Schmittberger, and Bernd Schwarze. 1982.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 *Journal of*

airiti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3(4): 367-388.

Higgs, Paul, and Chris Gilleard. 2010. "Generational Conflict, Consumption and the Ageing Welfare Stat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geing and Society* 30(8): 1439-1451.

Hogan, Robert, and Nicholas P Emler. 1981. "Retributive justice." In *The justice motive in social behavior*, eds. M. J. Lerner and S. C. Lerner.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Jasso, Guillermina. 1978. "On the Justice of Earnings: A New Specification of the Justice Evaluation Fun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1398-1419.

Jasso, Guillermina. 1999. "How Much Injustice is There in the World? Two New Justice Index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1): 133-168.

Jasso, Guillermina. 2000. "Trends in the Experience of Injustice: Justice Indexes About Earnings in Six Societies, 1991-1996."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3(2): 101-121.

Jasso, Guillermina, and Bernd Wegener. 1997. "Methods for Empirical Justice Analysis: Part 1. Framework, Models, and Quantiti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0(4): 393-430.

Jennings, M Kent. 2007.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 eds. R. J. Dalton and H.D. Klingeman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ohli, Martin. 1987. "Retirement and the Moral Economy: 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German Case."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2): 20.

Kohli, Martin. 2006. "Aging and justice." In *Handbook of Aging*

airiti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s. R. H. Binstock and L. K. George. Burlington, MA: Academic Press.

Lerner, Melvin J. 1980.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 Fundamental Delusion*. New York, NY: Springer.

Leventhal, Gerald S. 1980. "What Should Be Done with Equity Theory?: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Fairness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Social Exchange*, eds. K. J. Gergen, M. S. Greenberg and R. H. Willis. New York, NY: Plenum Press.

Mannheim, Karl. 1970.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Psychoanalytic review* 57(3): 378.

Marks, Lawrence. 1978. *Sensory processes: The new psychophysics*. Amsterdam, NL: Elsevier.

Möller, Judith Elisabeth. 2013. *Growing into Citizenship: The Differential Role of the Media in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Adolescents*. Amsterdam, NL: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Montada, Leo, and Angela Schneider. 1991. "Justice and Prosocial Commitments." In *Altruism in Social Systems*, eds. L. Montada and H. W. Bierhoff. Toronto, CA: Hogrefe & Huber.

Neundorf, Anja, and Richard G. Niemi. 2014. "Beyo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Approaches to Age, Period, Cohort Analysis." *Electoral Studies* 33(1): 1-6.

Niemi, Richard G., and Jonathan D. Klingler. 2012.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Among Young Adult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1): 31-54.

Niemi, Richard G., Harold W. Stanley, and C. Lawrence Evans.

airiti

1984. "Age and Turnout Among the Newly Enfranchised: Life Cycle versus Experience Effec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2(4): 371-386.

Ochs, Jack, and Alvin E. Roth. 1989.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Sequential Bargaining."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3): 338-354.

Plutzer, Eric. 2002. "Becoming a Habitual Voter: Inertia, Resources, and Growth in Young Adultho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1): 41-56.

Preston, Samuel H. 1984.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Divergent Paths for America's Dependents." *Demography* 21(4): 435-457.

Raudenbush, Stephen W., and Anthony S. Bryk. 2002.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Applic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shing.

Rawls, John.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ubenson, Daniel, André Blais, Patrick Fournier, Elisabeth Gidengil, and Neil Nevitte. 2004. "Accounting for the Age Gap in Turnout." *Acta Politica* 39(4): 407-421.

Sapiro, Virginia. 2004. "Not Your Parents'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troduction for a New Gener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9: 407-421.

Schmähl, Winfried. 1989.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Pension Systems." In *Workers Versus Pensioners: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n an Ageing World. Man-chester*

airiti

and New York, eds. P. Johnson, C. Conrad and D. Thomson.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Smith, Heather J., and Tom R. Tyler. 1996. "Justice and Power: When will justice Concerns Encourage the Advantaged to Support Policies Which Redistribute Economic Resources and the Disadvantaged to Willingly Obey the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6(2): 171-200.

Stevens, Stanley Smith. 1975/1986. *Psychophysics: Introduction to Its Perceptual, Neural and Social Prospects*. New York, NY: Routledge.

Thibaut, John W., and Laurens Walker. 1975. *Procedural Justice: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Hillsdale,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Thomas, David. 1989. "The Welfare State and Generation Conflict: Winners and Losers." In *Workers Versus Pensioners: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n An ageing World*, eds. Johnson, P., Conrad, C. and Thomas, D.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33-56.

Verwiebe, Roland, and Bernd Wegener. 2000.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Perceived Income Justice Gap."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3(2): 123-49.

Walster, Elaine Hatfield, G William Walster, and Ellen Berscheid. 1978. *Equity: Theory and Research*. Boston, MA: Allyn & Bacon.

Yang, Yang, and Kenneth C. Land. 2006. "A Mixed Models Approach to the Age Period 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 Section Survey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Data on Trends

airiti

in Verbal Test Score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36(1): 75-97.

Yang, Yang, and Kenneth C. Land. 2008.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Fixed or Random Effect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36(3): 297-326.

Yang, Yang, and Kenneth C. Land. 2013.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New Models, Method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Zannella, Marina. 2017. "Age, Economy, and Welfare." In *The Economic Lifecycle,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ed. Marina Zannella. New York, NY: Springer.

airiti

Justice and Redistribution among Cohorts: Perceptions of Just Earnings among Age and Economic Cohorts

Yi-Bin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str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Previous empirical studies in politics used to regard people as being part of the same political cohort if they grew up in the same political context.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a political cohort is inappropriate in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 of just earnings among cohorts. Given this, the concept of an economic cohort is used in this study and economic cohorts refer to those who grew up in the same economic context. Methodologically, this study utilizes the cross-classified random-effects model to scrutinize perceptions of redistributive justice among economic cohorts because this model is able to correct biased estimators caused by the severe multicollinearity between age groups and cohorts.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different economic cohorts possess varying perspectives on what just earnings are, while people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also exhibit significant diversity in their perceptions of just earnings. Secondl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some explanatory variables such as male, marital status, a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subjective higher

social class, and ethnicity (mainlander) are more likely to regard earnings as over-rewarded. Finally, the perceptions of just earnings reflect the life cycle effect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People aged 20 to 29 are those who are most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earnings, whereas people over the age of 30 gradually becom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ir rewards. In general, senior economic cohorts are more likely to regard their earnings or income as over-rewarded injustice, while junior economic cohorts exhibit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regard their income as under-rewarded injustice. The diversity of perceptions of just earnings between senior and junior economic cohorts may be due to changes in income structure caused b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r industrial change.

Keywords: age, economic cohort, cross-classified random-effects model, redistributive justice, perception of just earnings